

“化境” = 解构?

——比较钱钟书“化境”说与解构主义翻译观

高佳艳

摘要: 钱钟书的“化境”说和解构主义翻译观分别被视作中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西方解构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一些学者开始将钱钟书的翻译观和解构主义翻译观相联系,而两种翻译观是否具有一致性则成为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本文认为,这场争论的关键在于研究者对“意义不确定性”“化”“讹”等基本核心概念缺乏深入讨论。两种翻译观中的“意义不确定性”背后隐藏着截然不同的意义观,钱钟书对“化”与“讹”关系的阐述更是证明了他将原作奉于译作之上的立场,而对于流畅译文的推崇更是蕴含着解构主义翻译观所要打破的翻译暴力。将“化境”说与解构主义翻译观相类比甚至等同不利于我们正确理解解构主义翻译观的精髓,也会让人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产生误解,本文或有助于我们正视两种翻译观并结束这一系列不必要的论争。

关键词: 意义不确定性; 化境; 解构; 忠实; 讹

[中图分类号] H315.9

DOI: 10.12002/j.bisu.0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2017)03-0059-13

引言

1964年,钱钟书(2007b: 77)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并指出“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从此“化境”说作为钱钟书翻译观的核心思想成为中国翻译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罗新璋(2009: 20)认为钱钟书的“化境”说将“翻译从美学的范畴推向艺术的极致”,把“化境”纳入整个中国翻译思想发展的脉络中,称“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方解构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一些学者开始将钱钟书的翻译观和解构主义翻译观相联系。有些学者认为钱钟书的“化境”说体

现了西方解构主义翻译观的解构特征，是中国的解构主义翻译观（黄汉平，2003：122~126；于德英，2009；李文革、王瑞芳，2010：101~104；冯立新，2012：130~140）；另一些学者如陈大亮（2006：1~6）认为不可将两种翻译观混为一谈，但应该看到在翻译问题上，钱钟书的解构思想主要表现在意义不确定、翻译距离和译文可超过原文三个方面。概括起来，两类主张虽有分歧，但思路不无相似之处：从钱钟书认为文学语言具有多义性、隐喻性，钱钟书看到翻译中的“讹”或者距离问题，钱钟书赞赏林纾的翻译，推导出钱钟书认为翻译的原文意义具有不确定性、翻译具有不可译性；从钱钟书主张译文优于原文，进一步推出钱钟书解构了意义、解构了翻译中原作和作者的权威、打破了传统的忠实标准。从而得出结论：钱钟书的翻译思想等同于解构主义或具有解构主义特色。

仅有极少数学者对以上观点提出反驳，刘全福（2005：17~20）批评了一些研究者试图用解构主义思想解构“信、达、雅”和“化境”说的现象，指出钱钟书的“化境”体现了“忠实”的标准，与解构主义翻译观背道而驰。不过大概限于篇幅的原因，刘并没有深入探讨两种翻译观背后的差异实质，因此为反对方所质疑：“他（刘）在文章中没有说明、没有证明的东西就没有理由作为结论让别人接受下来”（陈大亮，2006：1~6）。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文章对这场争论的根源和两种翻译观的深层差异专门进行深入探讨，有关“化境”说和解构主义翻译观之间的纠葛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正如“化境”说被认作中国翻译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解构主义翻译观也同样被西方学者看作西方翻译理论中的重要派别。埃德温·根茨勒（Gentzler，2004）更是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一书中专辟一章来探讨与立足于“对等”“忠实”等概念的传统翻译理论相比有重大突破的解构主义翻译观。两种翻译观在“意义不确定性”“讹”等概念表述上看似有相通之处，但是打破这些核心概念和相关表述相类似的假象，我们就会发现，“化境”说并没有走出传统翻译理论的范畴，将“化境”说与解构主义翻译观相类比甚至等同不利于我们正确接受解构主义翻译观的精髓，也会让人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产生误解，进而引发一系列不必要的争论。

本文认为，相关研究争论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看到所谓“意义不确定性”这个表述背后隐藏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观。此外，研究者对钱钟书翻译思想中“化”与“讹”的关系认识不足，夸大了“讹”的地位，误将“讹”和钱钟书对林纾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的赞赏等同于钱对原作的解构。这不仅是对“化境”论的曲解，也是对解构主义翻译观的误解。

应该说明的是,本文旨在廓清钱钟书的翻译观与解构主义翻译观之间的差异,至于钱钟书整体思想中是否有解构成分,这不是本文的关注重点。重要的是,即便钱钟书的思想中有解构成分,也并不意味着其翻译思想中就一定有解构成分。

本文将以钱钟书“化境”说的来源——《林纾的翻译》一文和其它与翻译相关的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结合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 Derrida)、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等人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围绕两个问题展开讨论:(1)研究者所谓钱钟书认可的“意义不确定性”是不是相当于对意义的解构?(2)译文的“化”与“讹”是不是对原作的解构?下文首先剖析一下钱钟书的意义观。

一、“意义的不确定性”是否是对意义的解构?

如前所述,研究者认为钱钟书承认“意义的不确定性”的理由是:钱钟书在论著中多次谈到词语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和意义的增生性,认为理性与文本存在距离,且作家创作时文不逮意、文不必如其人、言不必为心声的情况普遍存在(陈大亮,2006;冯立新,2012;于德英,2009)。由此认为钱的翻译思想具有解构性质,因为所谓“意义不确定性”正是解构主义者的主张。但是仔细思考会发现,此“意义不确定”与彼“意义不确定”看似一致,实则建立在迥然相异的意义观上。钱钟书翻译思想中的“意义不确定性”背后隐藏的逻辑是:意义作为先验性存在,是稳定的,但因为语言作为表达意义的工具具有局限性,因此导致意义不可确定。而解构主义翻译观中“意义不确定性”(uncertainty)的前提是从根本上否定“先验的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着重强调意义作为语言的依附,具有偶然性、运动性和即逝性特征。前者可理解为“意义难以被窥破”,因为语言文字表意不全面,或可译为“undiscernability”;后者可理解为“意义无定性”(uncertainty),源于语言符号的差异性。

1. 钱钟书翻译思想中的意义观

我们不否认钱钟书认为语言具有多义性、互文性、隐喻性等特点的观点,但这并不等于意义本身无常无定或解构主义的“意义不确定”。研究者多将钱钟书《管锥编》中《论“易”之三名》和《谈艺录》中的诗歌评论如《庾子山诗》中“盖谓‘义’不显露而亦可游移,‘诂’不‘通’‘达’而亦无定准,如舍利珠之随人见色,如庐山之‘横看成岭侧成峰’”(论据A)、“窃谓倘‘有寄托’之‘诗无通故达诂’,可取譬于苹果之有核,则‘无寄托’之‘诗无通故达诂’,

不妨喻为洋葱之无心矣”（论据 B）（钱钟书，2007d：721~730）等视作钱主张意义不确定性的依据（陈大亮，2006；冯立新，2012；季进，2011；于德英，2009）。但仔细研读这些文章我们发现，研究者可能有所误解，这些论据非但不能证明钱钟书的“意义不确定”具有解构色彩，反而恰恰证明钱的意义观中隐藏着意义先于语言存在，意义为本体/中心、语言为工具的逻辑。

《论“易”之三名》一文通过对“易”一词的训诂进而总结出汉字一字多义之“并行分训”和“背出/歧出分训”的释义规律，这本身就蕴含了文字具有稳定意义结构的逻辑，一字即便多义，都不会逃出固定的语义范围，这正是典型的结构主义意义观。《谈艺录》中《庾子山诗》一文谈到后人对南北朝诗人庾信诗歌的种种阐释中不乏断章取义者，开篇讲的是“宋于庭言称张皋文，实失皋文本旨”并提到“诗无通诂”的说法“必主于一”的本质（钱钟书，2007d：721），而论据 A 是在讲宋于庭的误会之实，称之为类似于西方的“接受美学”和“拆散结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这一并列恰恰成了一些研究者认为钱钟书思想具有解构性的依据。但仔细探究，钱钟书是在批评宋于庭等人的解释像“赋诗断章”，类似西方解构主义，不顾作者原意胡乱发挥（周振甫，1992：64~72）。那么钱钟书认同解构主义的观点也自然无从谈起。而钱钟书在后来写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论言、象、意三者关系的《乾》一文中更是明确批判了借“诗无通诂”之名去读《诗》而导致宋代迫害苏东坡的文字狱等自由诠释的行为：“苟反其道，以《诗》之喻视同《易》之象，等不离者于不即，于是持‘诗无通诂’之论，作‘求女思贤’之笈；忘言觅此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丧所怀来，而亦无所得返。以深文周内为深识底蕴，索隐附会，穿凿罗织；匡鼎之说诗，几乎同管辂之射覆，绛帐之授经，甚且成乌台之勘案。自汉以还，有以此专门名家者。”（钱钟书，2007a：24）意即：切不可超越或抛开《诗》的言和象去揣度意义，而是要以特定的言和象为限制。因为对《诗》而言，意由言和象体示出来，言和象是意义的归宿，特定的言和象与特定的文情意义相对应。这种明显带有主观色彩的批判大概更能表明钱钟书意义观：文本存在一个固定的结构，正是这种先验结构限定了诠释的范围。而至于论据 B“有寄托”“无寄托”之说，更是直接表明作者之寄托是作为钱钟书讨论诗歌的前提和标准，作者之于文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依以上论据将钱钟书本人的“意义不确定”观同解构主义相联系实在有点牵强。

考虑到钱钟书思想著述的庞杂，我们不妨将讨论范围缩小至钱钟书后期专论翻译的《林纾的翻译》（钱钟书，2007b：77~114）及之前与翻译话题相关的《论不隔》（钱钟书，2007c：110~115）、《英译〈千家诗〉》（同上：264）

等几篇文章。

在《林纾的翻译》中，钱钟书（2010：257）指出：“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本文中的粗体均为引者所加）为了说明问题，这里引用的是1979年修改后的版本，与1964年版本相比，句子结构更为清晰，想必经过了作者的深思熟虑。其中粗体部分很明显省略了主语。我们不禁要问：在翻译中是什么“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是什么“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呢？从紧跟的下文“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便可看出，这本来应当保留不变使其“安稳地到达”另一种语言的东西正是原作的意义和口吻，更准确来说，是作者所领会的原作意义和口吻。这包含着多层意思：一，“失真”和“走样”表明原作及其意义和口吻是先于翻译的稳定存在；二，译者可以领会原作的意义和口吻，即便有所损伤；三，翻译是使用外国语言再现这种已经存在于译者头脑中的关于原作的信息，译者头脑中的信息是先于译语语言的稳定存在；四，“度越”“到达”“历程”“一路上”等词语则表明，翻译是换用一种语言为工具来运输特定意义的行为，原作遭受“遗失”“损伤”是翻译运输时发生的意外。

同时，钱钟书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表意工具具有局限性。在文中他指出：“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钱钟书，2010：257），那么什么是“体会”与“表达能力”之间的距离呢？结合上下文来看，很明显“有距离”说的正是用语言不尽能表达出所领会的全部意义。其实这种讲法和中国传统文论的“言不尽意”如出一辙，也就是说，说话者心中有确定的体会，但是不能用文字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亦即语言具有表意局限性。

有必要指出，在钱钟书看来，文学作品中，相对于语言，与意义同样居于主体地位的还有“口吻”“风格”，以及“旨”“情”或“志”。从《谈艺录》中《神韵》一文来看，“口吻”“风格”相当于“神韵”或直觉、“神识”层。而“意义”“旨”“情”“志”则偏重于知觉、理智层。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不时将“意义”和“口吻”“风格”并列，视作翻译中本应保留不变的原作成分。在写于1934年的《论不隔》一文中，钱钟书（2007c：113）提到：

“翻译学里‘达’的标准推广到一切艺术便成了美学上所谓的‘传达’说（theory of communication）——作者把所感受的经验、所认识的价值，用语言文字，或其他的媒介物来传给读者”。这种“推广”表明钱钟书不但认同翻译中原作意义有本体的地位，也认同艺术创作中“所感受的经验、所认识的价值”是先于语言的存在，而这些则都与意义同居主体地位。

换言之，对钱钟书而言，意义（情感和风格、口吻）是先于语言的先验存在，作品/译作是作者/译者对思想或情感的表达，是通过语言这种媒介创造出来的。这与解构主义的意义观截然不同。

2. 解构主义的意义观

解构主义者否定意义相对于语言的主体地位，否定文本有固定不变的终极意义，认为文本生成后有的只是语言符号，而意义具有偶然性、运动性、即逝性等特征。解构主义翻译观在多种语言的背景下审视翻译文本，颠覆了原作意义的主体地位。

《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一文被认为是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奠基作。本雅明在文章开头就对传统的文本向读者传递信息的观念提出质疑，指出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并非陈述事实或传递信息或某些不可测的、神秘的、只有诗人译者才可以再现的诗学元素（Benjamin, 2007: 70~71）。他认为在单独的、没有补充的多种语言间，意义决不会像在单个词、句中那样以相对独立的状态显现，意义永远在波动的不稳定状态中——除非能够以纯语言（pure language）的方式在多种意指方式（modes of intention）达到和谐状态的时候才能显现（同上：74）。而译者的任务也并非再现原作的意义，而是要重构原作的意指方式（mode of signification），从而让原作和译作都能够在一种更大的语言（即纯语言）中以碎片的形式被辨认出来，就好像组成大花瓶的碎片一样（同上：78）。可见，对本雅明而言，意义在文本中并不占有主体地位，译者所追寻的，并非固定不变的意义，而是多种语言相联系所产生的多样性互补状态以及由此建构的具有神学意义的纯语言。

福柯从根本上解构了原作及其意义：意义和作者没有永恒的联系，对于文本来说，无所谓特定的作者意图或者情感，更稳定的是依存于外界权力关系的话语。作品被看作权力关系作用于作者的产物，“作者”不是个人，而是社会中一系列复杂的权力运作下主体立场的结合。他指出，作品不是作家个体意识的创造物，而是创造了该个体的时代话语建构的结果，而作品也不是某些情感、品味、哲学真理的媒介，只是语言展示，语言文字不过是一些无规律可循、仅能证明自己暂时存在的语言痕迹（Foucault, 1973: 300）。根茨勒（Gentzler,

2004: 150)认为,对福柯而言,作品和作者与所处的但无法控制甚至毫无意识的时空规范密切相关。因此“创作行为”在现实中是一系列被“作者”这个指称简化了的复杂过程。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创作其实不过是具体时间和空间背景下一系列规则系统运作的产物,作品跟作者的理性、感性无关,作品所传达的意义因此也和作者无关,作者的意图无从谈起,有的只是特定环境中的文字符号暂时的能指。

德里达以索绪尔的语言观为出发点,进一步打破“能指—所指”的对应关系及语音和文字的等级区分,指出文本一旦完成,留存的唯有语言能指符号,而语言能指总是在与别的能指的差异中间、在不断地诠释中以延迟的方式暂时显现,不存在语言背后的超验的意义实体。德里达用“différance”来说明意义的不稳定性。他试图用这个“既不是词也不是概念”的表述来说明意义的两个特点:差异和延迟(Derrida, 1982: 3~27)。这双重含义特指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文本可以提供一种由于其差异性而导致意义产生的‘功能’;但另外一方面,因为这种文本所提供的意义产生行为永远都不可能以一种具体存在的形式停歇,其实际的具体化过程于是被延迟,从一个语言诠释延迟到另一个,一直处于运动或者追逐游戏中……处于无止境的倒退中(Abrams, 1999: 57)。那么,对于一个文本而言,阐释仅代表意义暂时的在场,也是我们认识理解词语符号的起点,意义完全是偶然的、暂时的和变化的。所以对德里达而言,语言背后没有固定的意义或任何超验的实体,所谓“作者意义”只是外界附加给文本的超验所指。这就根本上否定了作为人类理性产物的形而上的意义或者概念,否定了意义的本体地位。

深受解构主义思想影响的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同样认为意义是一个多元的偶然的关联行为,而不是一个不变的统一的本质性存在,因此译文不可以依据语义对等或一对一对等这类数学概念来评判(Venuti, 2004: 18)。也就是说,意义是相对的、多元的,是依时空条件而变化的,是许多能指符号之间进行关联的产物。因此翻译中就不存在原作的特定意义,自然翻译中的语义对等或原作—译作对等也无从谈起。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隐藏在这两种意义观背后的其实是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哲学观:一种认为,语言是人类用来反映客观世界,表达主体思想感情的工具;另一种认为,语言作为约定俗成的符号,符号之间的关联暂时有所指,因此不存在明确的固定不变的所指意义。

钱钟书意义为本体、语言为媒介的观念与传统哲学中意义为本源、语言为介质的思想如出一辙。无论是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庄子的“言不尽

意”、王弼的“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或是传统文评中的“文以载道，诗以言志”，都默认语言背后有特定的义理或者情感，在语言表达之前先有明确的内在意义，语言则是用来传达意义的工具，这是典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解构主义的产生以 20 世纪初西方哲学思想界将语言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转向”为背景，是对西方反逻各斯中心语言观的进一步发展。对解构主义者而言，文本的构成只是语言，是一系列相互之间具有差异的能指符号。解构主义者就是要解构先于语言存在的意义这种“先验的所指”，打破传统意义观对语言的限制，追寻符号的所指横向差异和纵向变化的痕迹。

二、“化”与“讹”是否是对原作的解构？

从已有研究来看，研究者认为“化”和“讹”代表着：钱钟书欣赏“讹”，支持译者在艺术水平上超过原文（陈大亮，2006；崔永禄，2006；葛中俊，2007）；强调“信”的不现实性，是对传统译论“忠实”的反对与背离，甚至进一步将这种译文的“化”和“讹”看成是“后起的生命”，是对原作的解构（黄汉平，2003；冯立新，2012；于德英，2009；李文革、王瑞芳，2010）。事实上，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从始至终都强调“如原作风格以出”“精魂故我”的“化”“讹”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过分强调“讹”的作用无疑是本末倒置。这些误解源于对“化境”说中“讹”的过分关注，误读了钱钟书对林译的态度。

1. 译文中的“讹”与钱钟书对“讹”的态度

首先，“化”与“讹”相生相伴，钱钟书对翻译中的“讹”是无可奈何，而绝非欣赏。钱钟书（2007b: 77）在《林纾的翻译》一文开头便援引《说文解字》，指出许慎将汉字“囿”训诂为“译”“诱”“媒”“讹”“化”几种意义，“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此外，钱钟书（同上：78）还指出，翻译时从起点到终点，“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单从“化”与“讹”并列作为同一汉字的意义分支，就可以看出二者相生相伴的命运，“讹”是“化”的副产品；再从粗体部分来看，钱钟书的语气中更多的是对“讹”作为一种瑕疵的无可奈何。

其次，钱钟书欣赏的是林译的“讹”所起的“媒”的作用而非“讹”本身。由于钱钟书在文中花很大篇幅探讨林纾翻译中的“讹”及其“媒”的功能，这容易让读者误以为“讹”和“媒”是“化境”的重要精神，钱对两者都持肯定

态度。但事实上,钱钟书肯定的只是“讹”之“媒”,即林译引导读者去读原作的功能。而对“讹”本身,钱则持较为复杂的保留态度。这体现在钱钟书将林译的不忠实分为三种:有意的润色增饰,不能解决问题任意删节的“讹”,及胡乱猜测的“讹”。钱只对林译第一种润色增饰表示了兴趣,但从根本上讲并不赞成林的“讹”,哪怕他“改得好”:“他(林纾)在翻译时,碰到他认为原作是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从翻译的角度看,这当然也是‘讹’。即使改得很好,毕竟变换了本来面目,何况添改未必一一妥当”(2007b: 84)。

可见,钱钟书的态度是:“讹”只是译者在追求“化境”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瑕疵,不得已的“讹”可以存在,但不支持主观性的“讹”。因此,我们决不当本末倒置,将“讹”看做“化境”说的主要精神,甚至以为钱钟书对之持肯定态度,从而认为钱钟书违背了“忠实”传统或解构了原作。

2. “化境”论是以原作为中心的翻译观

其实,单从钱对“讹”的定义来看,无论是“失真”“走样”,还是“贴合原文”,都流露出钱钟书以原作为评判标准的翻译观,更不用说他对“化”的阐述。1964年,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钟书(2007b: 77)首次提出: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一个英国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是读起来像翻译出来的东西**。

文学翻译的行为被描述成“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躯体”换了,那不变的“精魂”是什么?是“原作的风味”。在同一段,钱钟书(2007b: 78)提到“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者不很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即反逆者’”。可见,上文提到的“原作风味”对应“意义或口吻”,也就是说,原作意义、口吻或风味构成原作的“精魂”,是钱钟书认为在翻译中应该极力保留的东西。那么怎样做到“忠实得读起来不像译本”呢?从“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来看,钱推崇流畅地道的译入语。

那么钱钟书对“化”的定义可进一步简化为:(1)保存原作的意义和风格以忠实原作;(2)用流畅的目的语以便实现第一点。可见原作在他心中的地位。

此外,在钱钟书有关翻译的讨论字里行间几乎都可以发现他以原作为中心

的立场。比如在《论“不隔”》一文中，钱钟书（2007c：113）指出：“‘不隔’须假设着一个类似翻译的原作的东西；有了这个东西，我们便可作为标准来核定作者对于那个东西的描写是不是正确，能不能恰如其分而给我们以清楚不含糊的印象。在翻译里，这是容易办到的；因为有原作存在着供我们的参考”。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钱钟书认为衡量翻译好坏要以原作为基准，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应当且“容易办到的”。在1932年发表的《英译〈千家诗〉》一文中，钱钟书（同上：264）批评译者“每译歌行为无韵诗，衍绝句为长篇，头面改易，迥异原作”，指出“至其遗神存貌，践迹失真，斯又译事之难，于诗为甚”。《论“不隔”》一文对比阿诺德的翻译主张和王国维的“不隔”，指出“‘不隔’须假设着一个类似翻译的原作的东西；有了这个东西，我们便可作为标准来核定作者对于那个东西描写是不是准确……。在翻译里，这是容易办到的；因为有原作存在着供我们参考，在文艺里便不然了……”（同上：112），让读者看到原作的“本来面目”，指出“好的翻译，我们读了如读原文”（同上：113），这些思考无不表露出他对原作的尊重。

这与解构主义力图解构原作霸权的思路完全不同。但是还有人会质疑：既然钱钟书支持“化”也认为“讹”不可避免，推崇“读起来不像译本”的翻译，那么这不是相当于承认将译文作为独立的审美体，支持译者的创造性吗？难道这不是一种对原作的解构？这种疑问源自没有看到“化”所蕴含的“翻译暴力”。

3. “化”与“翻译暴力”

从钱钟书散见于《谈艺录》《管锥编》的翻译实践来看，他所践行的翻译方法正是不拘于源语文字形式，而用流畅地道的中文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和风格（郑延国，2011：42~45），这点本文不再赘述。我们仅需注意到，钱钟书实践“化”的根本途径就是用流畅的译入语进行翻译。而这种倡导使用流畅的译入语的翻译策略，实际上蕴含着解构主义者所要打破的所谓“翻译暴力”。

如前所述，“化”的途径是用流畅的、不留“生硬牵强”痕迹的译入语进行翻译，这本质上是对源语话语的一种消灭。而“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讹”更是一种对源语异质成分的“暴力消灭”，是对语言差异性的消除。钱钟书说翻译是从起点走到终点，从一种语言形式到另一种语言形式，会出现“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的“讹”，言下之意就是说，意义和风格会因为不得不遵从目的语的语言表达习惯而程度不等地背离原文，即哪怕以损失原作意义和风格为代价，也要消除由原作带来的陌生的异样的成分，用不露翻译痕迹的译语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的“化”代表着目的语言文化的统治以及对差异的抹杀。

比如韦努蒂就认为流畅翻译(smooth translation)体现出一种目的语语言文化系统对源语文本的语言、文化特征所施加的暴力,翻译本身就是译入语语言对译文文本所承载的语言和文化特色的暴力替代,因为在翻译过程中源语文本不得不根据译入语系统中的价值信仰和表达规范被迫接受重组。而传统翻译的目的也常常是将一个文化他者转变为熟知的同类,因此翻译就成了篡改异质文化、为译入语体系文化、经济、政治目标而服务的行为(Venuti, 2004: 18)。韦努蒂提倡在翻译实践中抵抗译入语主流话语的语言暴力,他借用并进一步发展了施莱尔马赫“异化”(foreignization)的概念,阐明了如何用抵抗式的异化策略打破翻译中的这种暴力。在韦努蒂看来,“异”不是对源语异质元素在译文中简单的复制或保留,而是在译入语语境中构建起来的“异”,是要扰乱译语语言中盛行的主导文化语言规范,用抵抗的方式表明译文所代表的是不同于主流话语规范的存在(Venuti, 2004: 18)。

结语

即便有学者认为钱钟书做学问的精神与解构主义有着精神上的一致性,钱钟书对解构主义有相当的了解(季进, 2011),我们也绝不应该简单地推而广之,认为其翻译思想也一定具有解构特征。在钱钟书的翻译思想中,意义先于语言存在,原作是译作的参考标准。解构主义翻译观则彻底颠覆了原作和译作的等级关系,解构了先验的所指意义,转而关注语言差异。对解构主义者而言,翻译只是呈现语言差异、揭示语言在不同能指环境中所经历的变化从而解构权力暴力的手段和方法,翻译作品不过是一个展现差异的平台。他们感兴趣的是翻译行为所涉及到的差异性、多样性的集中表现,以及差异背后的历史和权力关系。如果一定要说他们提出了什么翻译策略,那也只能是突显语言差异的异化策略,绝非钱钟书所提出的抹杀差异的“化”或“讹”。钱钟书以原作为中心的“化境”说基于意义为本源、语言为工具的中国传统语言观,追寻的是原作固有的意义与风格,评判译文以原作为基础,生产译文采用符合译入语主流规范的策略,这些都与解构主义相去甚远。

从本文分析来看,将“化境”说和解构主义翻译观不恰当联系,很大程度上源于“意义不确定性”这一概念的迷惑性,源于翻译研究者对解构主义和钱钟书关于解构主义的论述的片面理解以及对“化境”说中“化”与“讹”关系的本末倒置。考虑到“化境”说和解构主义翻译观分别代表着中国翻译理论和西方翻译理论发展中的重要发展阶段,厘清这些概念或有助于我们对两种翻译

观本身以及对翻译理论发展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Seventh Edition) [M] . Boston : Heinle & Heinle, 1999.
- [2] Benjamin W.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A] . *Illuminations* [M] . Zohn H (Trans.) . New York : Schocken Books, 2007.
- [3] Derrida J. *Margins of Philosophy* [M] . Bass A (Trans.)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4]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Things* [M] .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1973.
- [5] 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 Shanghai :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6]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 Shanghai :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7] 陈大亮. 重新认识钱钟书的“化境”理论 [J] . 上海翻译, 2006 (4): 1~6.
- [8] 崔永禄. 传统的断裂: 围绕钱钟书先生化境理论的思考 [J] .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 (3): 46~48.
- [9] 德里达·雅克. 书写与差异(上册)[M]. 张宁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10] 冯立新. 钱钟书翻译思想探微——以解构主义为视角 [J] . 社会科学家, 2012 (4): 130~140.
- [11] 葛中俊. “化境”背后: 钱钟书的文本价值论 [J] .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7 (1): 150~153.
- [12] 黄汉平. 文学翻译“删节原作”和“增补原作”的文化透视——兼论钱钟书《林纾的翻译》[J] . 中国翻译, 2003 (4): 26~29.
- [13] 季进. 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增订本)[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 [14] 李文革, 王瑞芳. 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重释钱钟书的“化境说”[J] .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4): 101~104.
- [15] 刘全福. 当“信”与“化境”被消解时——解构主义翻译观质疑 [J] . 中国翻译, 2005 (4): 16~20.
- [16] 罗新璋. 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 [A] . 翻译论集 [C]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09 : 1~20.
- [17] 钱钟书. 管锥编(第一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a.
- [18] 钱钟书. 七缀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b.
- [19] 钱钟书. 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 [M]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07c.

- [20] 钱钟书. 谈艺录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d.
- [21]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 [A]. 张俊才. 林纾研究资料 [C].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256~281.
- [22] 于德英. “隔”与“不隔”的循环: 钱钟书“化境”的再阐释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23] 郑延国. 钱钟书译艺举隅 [J]. 上海科技翻译, 2001(1): 42~45.
- [24] 周振甫, 冀勤. 钱钟书《谈艺录》读本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收稿日期: 2016-11-09

作者信息: 高佳艳,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100871, 研究方向: 文学翻译。

电子邮箱: gaojiayan@pku.edu.cn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投稿启事

为提高本刊出版质量, 规范论文格式, 现对投稿提出以下要求:

一、来稿格式应为 A4 页面 Word 文档, 正文宋体小四号字。请登陆学报网站 (<http://journal.bisu.edu.cn>) 投稿系统上传电子版。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 本刊不再接收纸质投稿。

二、请于标题下注明作者姓名 (应加脚注提供作者简介, 详见下四)、工作单位全称、通信地址及邮政编码。

三、来稿须包含中文摘要、中文关键词、英文题目、英文工作单位名称、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中文摘要字数 200~300 字左右。自 2016 年起, 本刊采用英文长摘要, 摘要字数不少于 300 单词。关键词不少于 5 个, 以分号隔开, 且必须在摘要中体现。

四、首页正文下方应以脚注形式提供作者简介, 格式为: 作者姓名 (出生年月)、性别、籍贯、学位、现任职单位、职务职称、主要研究领域、主要学术贡献 (不超过 20 字)。各类基金项目应在脚注中注明基金项目名称, 并在圆括号内注明项目编号。多项基金项目请依次列出, 以分号隔开。

五、标题层次序号一般采用四级编号, 格式为: 一、1、(1)、①。如层次超过四级, 请用英文字母编号: a、(a)。

**Does “Transmigration of Soul” Equal Deconstruction? :
A Comparison of Qian Zhongshu’s Translation Idea
and Deconstructionist Translation Theory**

GAO Jiaya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Qian Zhongshu’s translation idea and deconstructionist translation theory are respectively regarded as one of those important development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As deconstructionism got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China around the turn of 21st century, some scholar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ried to associate Qian Zhongshu’s translation idea with it. Whether the two are identical thus became an issue causing long-term debate.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is debate was actually based on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some basic but critical terms like “uncertainty of meaning”, “hua” and “e”. “Uncertainty of meaning” in Qian’s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term in deconstructionists’ which indicates a contrary idea in meaning conception. In addition, Qian’s illustration of “hua” and “e” in translation indicates the dominance of the original work over the translation. His advocacy of smooth translation further betrays a kind of translation violence which deconstructionists work to break up. An improper association of the two will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 of deconstructionist translation theory as well a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paper is expected to help in putting the two translation ideas in their right position and this long-term debate to an end.

Keywords: uncertainty of meaning; transmigration of soul; deconstruction; faithfulness; betrayal